

王学在杭州书院的传播^{*}

兰 军 邓洪波

提 要 浙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发源地,杭州作为浙江省会所在,始终被阳明及其门人视为传承王学的重镇,书院则成为王学在杭城传播的中心。王阳明曾为万松书院撰写记文,更有意将天真山视为其晚年讲学之地。阳明歿后门人弟子集聚天真,创建精舍,使其成为海内王门讲学传道之中心。万历初年,天真精舍虽遭朝廷禁毁,继起的勋贤祠在艰难境遇中仍为讲学保留了部分空间。万历后期,浙江巡抚甘士价为集众会讲改建虎林书院,再次将王学传遍浙江,其影响延至清初。

关键词 阳明心学 万松书院 天真书院 勋贤祠 虎林书院

The Dissemination of Wang's Learning in Hangzhou Academy

Lan Jun, Deng Hongbo

Abstract: Zhejiang is the birthplace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theory. As the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inheritance center by Wang Yangming and his theory followers, and the Academy in the city became the center to spread his theory. Wang Yangming wrote an essay for the new Wan Song college, and even considered Tian Zhen Mountain as the school ground in his later years. After Wang Yangming's death, people gathered in the mountain and created a vihara to promote his doctrine. In early Wanli period, Zhang Juzheng banned academies. Although Tian Zhen Vihara was destroyed, the consequential Hun Yin Temple still retained a space for lectures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 late Wanli period, the governor of Zhejiang Gan Shijie who believed in the learning of Wang Yangming rebuilt Hu Lin Academy to set the public speaking, which again spread the learning of Wang Yangming across Zhejiang, and its influence extended to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mind" of Wang Yangming; Wan Song Academy; Tian Zhen College; Hun Yin Temple; Hu Lin Academy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贵州省教育厅项目《阳明学在浙西书院的传播》(2015JD004)阶段性成果。

浙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策源地,不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浙江与江右、南直隶一直是王学传播的核心区域。王学在浙江各地的传播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学界以往关注点多集中在以宁、绍为主的浙东地区,认为王学在杭嘉湖平原未居主流地位。2012 年随着日藏孤本《勋贤祠志》的发现,大陆学者开始留意王学在杭州的传播。乔治忠以《勋贤祠志》为核心,对祠志编纂者喻均生平事迹,祠志本身体例、内容加以介绍,对从天真书院到勋贤祠的演变历程做了梳理^①。陈时龙围绕天真书院的禁毁与重建,着重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官员、士绅、僧侣等不同力量间的博弈、角逐过程,揭示了明中后期国家与地方社会间的双向互动。^② 钱明通过对天真书院史料的梳理,阐明了从“仰止祠”到“勋贤祠”名称转变背后阳明形象从学者型到事功型的实质之变。^③ 三篇论文各有侧重,分别从不同视角解读了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天真书院的历史流变。2013 年钱明在《王学的跨江传播与两浙的地位互换》中进一步揭示出从嘉靖到万历初五十年间因天真书院的兴盛使王门讲学中心出现从浙东向浙西转移的现象,点出杭州在王学传播地域中的重要性。^④ 本文则试图梳理自嘉靖初到明末,王学在杭州书院的传承演变历程。阐明天真书院在嘉靖年间的兴盛并非偶然,是从王阳明到钱德洪、王畿、孙应奎等儒者倾心经营的结果。天真书院之后朝廷对王学态度虽历经转变,但从勋贤祠艰难境遇中对讲学的坚守到为王门会讲而生的虎林书院,从萧廪、范鸣谦到甘士价、聂心汤他们对阳明心学阐扬的侧重点虽有差异,但在书院讲学传道,将杭州经营成王学传播重镇的努力始终未变。

一 万松书院:王学在杭州传播的首要阵地

万松书院是明代浙江省会官府书院,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在报国寺旧址改建。万松书院“庙貌规制略如学宫”^⑤,由衢州南孔后裔主持祭祀,自嘉靖初年始在王阳明及其门人倡导下开始讲论阳明学说。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仿与时任提学佾事的阳明门生万潮拓展万松书院讲学事业。“乃增修书院,益广楼居斋舍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顷;揭白鹿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⑥ 应潘仿、万潮之请,在绍兴家居讲学的王阳明作有《万松书院记》。记文阐明了书院在国家文教系统中处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即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的地位。王阳明批评当时儒学教育沉迷于科举之弊,集士人于书院目的在于“期以古圣贤之学”,认为“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如何达到明人伦,阳明主张以致良知为途径。“是固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⑦ 王阳明并不反对士人科举仕进,所批评者在于将为学

① 乔治忠:《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浙江学刊》2012 年第 6 期。

② 陈时龙:《论天真书院的禁毁与重建》,《明史研究论丛》2013 年第 4 期。

③ 钱明:《杭州天真书院的历史沿革及功能转化》,《教育文化论坛》2014 年第 1 期。

④ 钱明:《王学的跨江传播与两浙的地位互换》,《浙江学刊》2013 年第 6 期。

⑤ [明]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整理:《王阳明全集》卷 7《万松书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81 页。

⑥ [明]王守仁:《万松书院记》,第 281 页。

⑦ [明]王守仁:《万松书院记》,第 282—283 页。

视野局限于八股之文,提倡讲求身心性命实学基础上应举,反对元明以来程朱理学的繁琐支离。王阳明此篇记文是了解其书院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文中反映了他对万松书院以致良知接引士子,追寻古圣贤之学的期望。

万潮主掌万松期间,书院开始向士子传播阳明学说。嘉靖四年(1525),衢州西安生员王玘,乡试中式,限于额数未录名,在潘仿、万潮建议下聚业于万松书院。王玘在万松受万潮启发,与闻良知之学,即渡江拜王阳明为师,后与王畿等相交。王畿在为其所作墓表中记述到,“巡按洛阳潘公例行给赏,谋于督学五溪万公,聚业万松书院,以考其成。万为阳明先师门人,与闻师说,即渡江稟学。先师一见,喜其惛质庞厚无他肠,外朴内炯,心授记焉。”^①在万潮等阳明弟子鼓舞下,万松书院生徒开始信奉阳明学说。

嘉靖至万历年间,在地方官多次修葺下,万松书院规模不断扩展,阳明高足王畿、邹守益等在此举会讲学,阐扬师说。嘉靖三十六年(1557),邹守益在胡宗宪陪同下赴万松书院主持讲会。沈懋孝在《讲学述》中记载其二十一岁时,“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师东廓邹先生馆于西湖之万松书院,因折柬招四方讲学者三百人并侍邹先生之教几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阳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有会心处矣。”^②此次讲会能邀请邹守益赴浙,且集三百多士人论学达半月之久,可见当时万松书院在浙西王学传播中的影响力。万历初年,王畿赴万松书院为诸生讲解《周易》,其门人在《万松会纪》中记录到:

少松滕子率学博诸生,会于万松仰圣祠中,首举《乾》“潜”之说,请闻其义。……复问《蒙》“养”之义。先生曰:“蒙者稚也。‘山下出泉,蒙’,解之者曰‘静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无智巧、无技能、无算计,纯一无伪,清净本然,所谓‘蒙童’也。……吾人学不足以入圣,只是不能蒙,知识反为良知之害,才能反为良能之害,计算反为经纶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复还本来清静之体,所谓‘溥博渊泉,以时而出’,圣功自成,大人之学在是矣”。^③

王畿在讲学中指出儒者须以蒙为基础,复其本来初心,追寻良知良能,以成圣人之学,有意以良知之学影响万松书院诸生为学旨趣。《万松会纪》由王畿门人弟子整理,文中提到的先生应为王畿本人。钱明在《王阳明与明代杭州书院》^④中将上述引文之先生曾误解为王阳明。《万松会纪》中的少松滕子是万历初任浙江提学副使的阳明门生滕伯轮,此时王阳明已过世多年。万历五年(1577),万松书院再次扩建,滕副使曾作《新建继道堂穷理、居敬二斋记》,期望在院诸生能传承阳明学说以“穷理居敬,而不惑于二三之说,则此心光明莹彻,洞然八荒,万世道脉,学者亦将印证于吾心,而上继道统其在斯矣。”^⑤

万松书院是明代浙江省会书院,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优秀生员、举人肄业其中,自嘉靖初年便在阳明及其门人弟子影响下开始讲论良知学说,与绍兴稽山书院并称为当时越中

① [明]王畿著,吴震编校:《王畿集》卷20《中宪大夫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在庵王公墓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36页。

② [明]沈懋孝:《长水先生水云续编·讲学述》,转引自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③ [明]王畿:《王畿集》卷5《万松会纪》,第128—129页。

④ 钱明:《王阳明与明代杭州书院》,《杭州》2009年第12期。

⑤ 魏颂唐:《敷文书院志略》,见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王门两大学术重镇。它是杭州各书院中最早的王学传播阵地,对后来天真精舍的创建,王学在杭州地区的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二 天真精舍:王门后学聚讲中心

天真精舍是继万松书院之后杭州另一所王门讲会书院,其修建本身即是为了完成阳明讲学天真的遗愿。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奉朝廷之命赴广西讨伐贼寇,路经钱塘时与钱德洪、王畿、杨思臣等游览天真山。《阳明年谱》记载: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岩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师昔在越讲学时,尝欲择地当湖海之交,目前常见浩荡,图卜筑以居,将终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随师渡江,偶登兹山,若有会意者。临发以告,师喜曰:“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遗以二诗,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①

在天真山建院讲学是王阳明生前心愿,曾多次与钱德洪、王畿等弟子通过书信往来筹划,只因阳明过早离世,筹建方案遂被搁置。阳明歿后,为团结门人弟子,感念师恩,由薛侃、王臣牵头,董沔、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众多门生“醵金鬻寺僧地”,于嘉靖九年(1530)秋建成天真精舍。精舍规模宏大,“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藏书室、望海亭,左为嘉会堂、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日新馆,傍为斋舍。”^②精舍建成后,身为王门“教授师”的钱德洪、王畿相继从绍兴移居杭州,担任书院主讲,主持日常事宜。祭祀与讲会是精舍最主要事业,每年四方弟子于春、秋两次集聚天真祭拜先师,随后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讲会活动,动则百余人。据《阳明年谱》载此时精舍“斋庖庾溷具备,可居诸生百余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③

天真精舍的修建凝聚了浙中、江右、岭南等地王门儒者心血,也成为嘉靖到万历初年最活跃的王学讲会之一,影响力辐射浙、苏、皖、赣等省。嘉靖十六年(1537),王畿与薛侃讲学于杭州天真书院^④。三十六年,休宁黄九成移居天真书院,从学于钱德洪、王畿,期间书院集会者达数百人,讲诵咏歌之声,昕夕不辍^⑤。三十九年,邹守益应胡宗宪之邀,入浙拜谒阳明祠,会讲于天真书院。四十三年秋,王畿主讲天真书院会,四方士大夫盛集,与会者达四百五十二人,唐一庵、沈懋孝、周都峰、徐龙湾等从之^⑥。隆庆六年(1572)初夏,阳明弟子管南屏主教于天真精舍,孙应奎等与其相互论学达四个多月^⑦。万历四年(1576)

① 《王阳明全集》卷36,第1467页。

② [明]邹守益著,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7《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82页。

③ 《王阳明全集》卷36,第1467页。

④ [明]王畿:《王畿集》卷20《梅岭周君墓志铭》,第626—627页。

⑤ [明]焦竑:《焦氏澹园续集》卷10《参议黄公传》,伟文图书出版公司刊“明代论著丛刊”第3辑,1977年,第13页。

⑥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⑦ [明]孙应奎:《燕诒录》卷7《兵部左司管管子行墓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9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97页。

秋,许孚远与王畿弟子祝介卿会于天真书院,相与论学达月余^①。此时的天真书院俨然已成为浙中、江右等王门后学集聚论学之中心,精舍虽位于浙江但作为后阳明时代学派的重要象征,其影响是全国性的。

天真精舍最初由王门弟子集资所建,经费来源相对单一,曾一度陷于困境,待地方官府力量加入后方走向振兴。精舍初期虽“置膳田以待四方学者”^②,继而又有“门人僉事王臣、主事薛侨,有事于浙,又增治之,始买田七十亩,欲备蒸尝茸理”,^③仍出现了诸生廩饩不给现象。天真精舍事务主要由浙中王门领袖王畿、钱德洪、柴凤、孙应奎等人打理,在解决财务危机上诸人曾出现分歧,加上绍兴王府的趁机侵夺使天真精舍在归属上曾岌岌可危。主管精舍初期财务的孙应奎在《与友人》书中谈到“此间精舍所入,亦云印刻几三十年,米无升合之储,故众论嚣然,无背无面”^④。嘉靖十五年(1536),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景动用官府之力对精舍田产加以扩充,才最终摆脱经费困境。此后,在浙江地方官府支持下,天真精舍陆续展开几次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学田日益充盈,书院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真正承担起全国范围内讲论与传播阳明学说的重任。这一时期因较多官员参与书院建设活动,书院也从单纯门人追祭先师、讲论王学的功能扩展为对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整体凸显。嘉靖到万历初年,在王门弟子和浙江地方官员经营下,天真书院可谓风生水起,成为整个王门后学讲学传道的大本营。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创办书院科敛民财为借口废毁天下书院。朝廷虽有废书院为公廨衙门的明令,实际上仍有许多书院在当地讲学官员庇护下得以保存。如白鹿洞书院在万历七年“都御史邵锐以白鹿书院有敕额,不便拆毁,量留田三百亩备祭祀。巡道王桥随请留星子、都昌二县田,以建昌县田千余亩变价。”^⑤张元忭在《答傅太守》中提及:“稽山书院者,文公之祠在焉,二时皆有祭,盖越中盛典也。近奉明旨,所在书院虽毁,而先祠及公馆率仍其旧。盖立法诚严,而委曲调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⑥但天真精舍因时为海内王学传播中心,为张居正重点关注,朝廷重压下,浙江官员未采取变通保护策略,精舍院产遂为地方豪强与周边僧侣侵吞,“精舍田号膏腴,天龙诸富僧及里中豪脾睨久矣。遂遭会倡言与诏书合,宜毁。而当塗诸司懍懍奉诏令惟谨,莫敢抗议。髡其山,夷其宫……五六十年之所经营,业已鞠为茂草”^⑦,天真精舍归于毁灭。

三 勋贤祠:艰难境遇中的坚守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其禁毁书院之举遭到朝野指责,部分朝臣上书要求复建被拆毁书院,恢复讲学活动。万历十一年十月,吏科给事中邹元标在《直抒肤见疏》请

① [明]许孚远:《敬和堂集》,日本内阁文库明万历二十二年叶向高序刊本,第16页。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6,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③ [明]黄绾著,张宏敏编校:《黄绾集》卷14《天真书院田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7页。

④ [明]孙应奎:《燕诒录》卷5《与友人》,第574页。

⑤ [光绪]《江西通志》卷82,《续修四库全书》第658册,第149页。

⑥ [明]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3《答傅太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4册,第374页。

⑦ [明]喻均:《勋贤祠志·沿革总叙》,日本内阁文库万历刻本,第2b-3a页。

求“凡所拆书院、先贤遗迹，宜敕礼部令郡邑，或概议修复，或量为调停。”^①兵科给事中王亮直接向朝廷奏请“先臣王守仁书院，并书院学田不当归入里甲”^②。此时朝廷对书院讲学仍有顾虑，做出了“近时私创书院已经拆毁者不必概复外，如果有先贤所遗或系本朝敕建者曾经拆毁，量为查复”^③的谨慎回应。

具体到天真精舍，则要求浙江巡抚、按察使等官员查明“先年奉何明文盖造，动支何项钱粮，应否议复。所称书院学田，是否学徒置买或系废寺地土，应否归入里甲”^④等情况后上奏朝廷斟酌。时右副都御史萧廩巡抚浙江，萧为江西吉安人，早年与江右王门儒者欧阳德、邹守益交游，深受王学熏陶。萧廩接到朝廷复奏要求后与巡按范鸣谦协商，派人查覆天真书院实情，并协谋恢复。二人在回复朝廷奏疏中为争取皇帝赐额对天真书院史实做了部分删改。诸如，以阳明先生祠指称天真书院；强化书院祭祀功能弱化讲学事业；简略地方官员动用官资扩建书院之举；将废毁之因归结于地方僧民覬觐书院产业，地方官员未能灵活执行朝廷禁毁书院的法令等^⑤。为使朝廷批准其申请，萧廩在奏疏中还述及只用书院原有产业年租及拆毁后的石木工料便足以完成祠宇复建，不动用官府之资。但实际复建过程中两浙巡抚衙门、藩司、臬司、盐道共出银 400 余两^⑥。勋贤祠最终因属王阳明尽忠建勋留宿之地而被赐额敕建，管理权被纳入官府，经费开支由县儒学训导掌管，旨在凸显阳明建功报国、明道淑人形象。此时勋贤祠因受制于官府，在功能定位上已大不同于天真书院。

从勋贤祠内建筑用途及经费开支上，仍可推断祠宇为讲学传道保留了部分空间，使王学在杭州的传播不绝如线。首先，勋贤祠主体建筑由大门、祠堂、隆道堂、燕居堂、僧房与厨房几部分构成。“祠堂后凿石而上，仍建一室，为当路荐绅及四方衣冠萃止之处，规制与祠堂埒，中丞萧公扁曰隆道堂。”^⑦，“祠几若干楹，前为门，勋贤祠额在焉。后为隆道堂，以待游学与质明行事者。”^⑧祠志记载虽较隐晦，从中还是能够判定隆道堂应为阳明门人集聚讲学之处。其次，勋贤祠每年田、地、山、荡的租银收入共 25.68 两，米 176.44 石，除应纳秋粮税赋外，实有余银 10.8126 两，米 161.8245 石可供常年支取。祠宇常年开支主要有春秋二祭、守祠僧侣禄米支出等。剩余银米则用于祠宇建筑的维修、四方同志来此讲学传道的贴补和当地水旱灾年的赈济上。祠志中载“或四方同志至止本祠，诱诲后学，有功斯道者，亦量行资助。”^⑨从勋贤祠经费开支上可以看出其为举行会讲提供了部分客观条件。再次，万历三十四年（1606），浙江巡抚甘士价与钱塘县令聂心汤曾一起造访勋贤祠，看到当时“群诸生会讲，观者如堵”^⑩的景象。万历三十六年，周汝登曾两次受邀

① [明]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 1《直抒肤见疏》，《续修四库全书》第 481 册，第 22 页。

② [明]喻均：《勋贤祠志·恢复纪六》，第 13a 页。

③ [明]喻均：《勋贤祠志·恢复纪六》，第 13a-13b 页。

④ [明]喻均：《勋贤祠志·恢复纪六》，第 13b 页。

⑤ [明]喻均：《勋贤祠志·恢复纪六》，第 14b-15a 页。

⑥ [明]喻均：《勋贤祠志·沿革总叙》，第 5b-6a 页。

⑦ [明]喻均：《勋贤祠志·祠宇纪》，第 8a 页。

⑧ [明]萧廩：《修复勋贤祠碑记》，喻均《勋贤祠志》，第 26a-26b 页。

⑨ [明]喻均：《勋贤祠志·经费纪五》，第 12b 页。

⑩ [万历]《钱塘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第 2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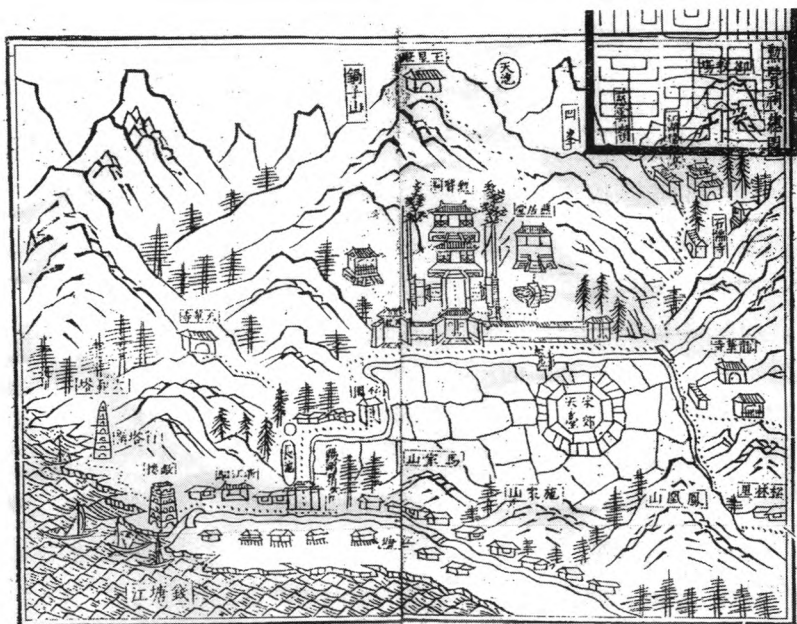


图1 《勋贤祠志》所载形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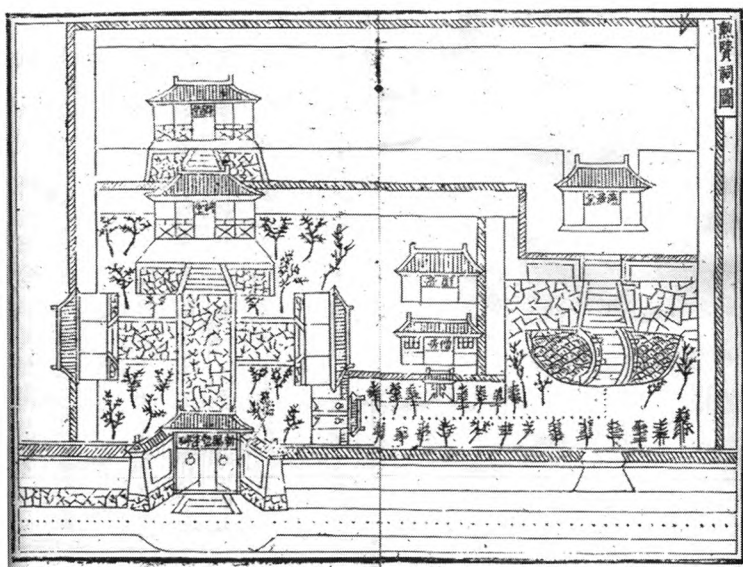


图2 《勋贤祠志》所载平面图

赴勋贤祠参与甘士价主持的讲会活动记述到：“戊申春仲次丁之期，予抵祀阳明夫子于天真祠下，因得追随紫亭甘公，相与论学，多士翕从，桥门云拥。已而公辟讲所，申盟约，颁行郡邑，两浙道运弥昌。……明年仲春，予复赴兹期，公时有内召之命。思盛事不可无述，而更有所远期公者，作天真讲学图，并为序言，将以贻公。”^①从周汝登记文中可以看到时人

① [明]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7《天真讲学图序赠紫亭甘公·再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5册，第540页。

已将勋贤祠视为天真书院的延续,继勋贤而起的虎林书院也志在承继天真讲学事业。

四 虎林书院:王门讲会的复兴

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甘士价受命巡抚浙江,到任不久便与诸生探讨阳明之学,在杭城举办王学讲会。因万松书院、勋贤祠远在山谷,难以满足较大规模士人集会之需,另寻会讲之地便势在必行。万历三十六年,钱塘县令聂心汤议请将原散署改建虎林书院,作为继天真精舍、勋贤祠后王学在杭州的传播中心。

虎林书院的改建由杭州各级官府协力而成。巡抚甘士价“檄藩、臬、郡邑谋改建焉,命心汤拮据其事。”协助筹划、捐俸的还有按台、鹺台、藩司、臬司、督学、别驾、司理、鹺司,仁和、海宁等各衙门官员。书院位于杭州清河坊北,元时为平准行库,明正统年间为镇守宦官府衙,嘉靖时改为吴山书院。后遇有大臣镇抚浙江,仍居其处,新建抚院后,此处遂为散署^①。建成后的虎林书院规模庞大,前为大门楼,中因仪门改建明贤堂,祀明朝理学诸公。中为凝道堂,后为友仁堂,重门洞开,可坐数百人,以便会讲。堂之左右为门,各建三馆,馆各有堂、有室,缭以周垣,以待诸士肄习及四方来学者。最后为藏书楼,贮经史、语录诸书^②。书院因会讲而生,首要职能在于集会讲学,规模可达数百人。院中不仅有普通生员肄业,还有进士、举人等高功名官员、士绅在此进德修业。虎林书院经费来源较为特殊,不仅“门之前有隙地,听民为屋若干间,入租供讲习费。”若不足书院之需,“则取勋贤祠赢租继之,均为讲学用,无彼此也。”^③表明地方官府已将虎林书院视为勋贤祠的继承者。书院不仅承续了勋贤祠祭祀阳明、传播王学的事业,还在经费上与其一体而用,无彼此之分。

虎林书院在祭祀上较天真书院、勋贤祠具有更强的地域性特征,院内明贤堂专祀浙江诸儒。其原因在于筹建书院的地方官员对勋贤祠所列配祀诸贤中浙人稀少状况的不满。“虎林故有天真祠,文成裳衣在焉。及门列配,半籍四方,而浙产诸贤未有同堂合俎秩而祀之者。”^④虎林书院明贤堂所祭十贤分别为陈选、章懋、徐爱、王畿、钱德洪、季本、陈善、唐枢、许孚远、张元忭。巡抚甘士价与王门儒者周汝登、陶望龄等均有密切交往。书院初建时甘氏曾有意聘陶望龄主讲,因陶氏太夫人病重,遂未受聘。“中丞紫亭甘公来抚浙,迫生天真讲席。既治虎林书院,复来聘先生,为谢不往。戊申,太夫人病亟,先生焦心医祷,颜色为枯。”^⑤虎林书院建成不久,甘士价因积劳成疾而卒,浙江诸官绅遂在书院之阳建甘公祠以祀。继任浙江巡抚高举继甘氏遗愿,致力于主持书院会盟,昌大王学。

虎林书院原为立讲会,倡导王学而建,故十分重视会约的制定。书院初建时所订《虎林会约》与《虎林书院志》均已遗失,只在顾宪成《虎林书院记》中存有相关记载“公臧示《虎林书院会约》,独主白鹿洞规,而自为之阐发厥旨,复推而广之,共为八条。会讲之日,首以谈玄说妙为戒,要在切近精实,上下皆通,一似有概于予言然者。”^⑥甘巡抚曾将虎林

① [万历]《钱塘县志》,第245页。

② [万历]《钱塘县志》,第255页。

③ [万历]《钱塘县志》,第255页。

④ [万历]《钱塘县志》,第249页。

⑤ [明]黄汝亨:《寓林集》卷11《祭酒陶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69册,第142页。

⑥ [万历]《钱塘县志》,第248页。

书院会约与顾宪成做过商讨,确定讲会主旨在于务实,反对王学末流虚无空谈之风,修正王学禅学化倾向。从时任浙江督学陈大绶所作《会约序》中也可窥见书院会约的制定过程。陈督学在记文中陈述其初到浙江拜谒甘士价时,两人为正杭城士习民风做过商讨。陈督学建言以官府功令约束,甘巡抚认为这仅是外在性法制,还需内在的讲学规制。为此甘氏一方面“遍檄东西诸郡,条议讲学规制”,向浙江各地官绅征询建议,又仿白鹿洞书院之制,“以人情而手自参订为规条,以使可久。”^①陈督学在考校各郡县诸生时,将甘士价制定的《虎林会约》推广到浙江各府县儒学与书院,“绶校士各郡,奉公意以倡诸郡邑,诸郡邑靡不设为科条,官师弟子,亦渐有蒸蒸向往者。”《虎林会约》也因此对万历后期浙江各府县儒学、书院会讲活动有着广泛影响。

五 小结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崛起,带动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王门弟子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又使阳明学得以迅速传播,两者的一体化进程,促成了明代书院与学术的辉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书院讲学运动中,浙中与江西吉安、安徽宁国成为讲论王学的核心区域。就浙中而言,王学在杭州的传播虽没有绍兴那般渊源早、根基厚,但因其两浙会城所在之政治、地理优势成为阳明学派苦心经营的重镇。

嘉靖初年赋闲在家的王阳明即留心于杭州宣扬致良知学说,在其影响下万松书院成为杭州最早讲论王学之地。继万松不久,阳明又与门下高足钱德洪、王畿等筹划在杭州郊外天真山建书院以为晚年归隐讲论之所。天真书院虽未在阳明生前建成,但在薛侃、王臣、钱德洪、王畿、孙应奎等门人弟子苦心经营下已然成为后阳明时代王学的象征与最重要的王门讲会之一。万历七年(1579),天真书院虽遭到毁坏,五年后右副都御史萧廌便上奏朝廷促成勋贤祠重建。祠宇管理虽秉承朝廷旨意,但以萧廌为代表的地方官仍为其保留了部分讲学传道功能,以上承天真遗续。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批准王阳明从祀孔庙,其学说也被纳入儒学正统,书院讲学的客观情势得以改善。浙江巡抚甘士价遂改建虎林书院以重兴王学讲会,此时讲学重点已转向合会朱、王,修正王学末流的禅学化弊端,经刘宗周、黄宗羲等大儒改造,最终为清初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兰军(1987—),男,山东蒙阴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邓洪波(1961—),男,湖南岳阳人,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

^① [万历]《钱塘县志》,第252页。